

秦嘉进京原因考

连振波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 东汉五言诗人秦嘉缘何进京的问题,关系到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从仅存的一些文献资料看,秦嘉进京的真实原因,是因受到了朝廷的强行征召,被动地卷入了东汉残酷的政治漩涡,从而让一代天才诗人无声陨落。

[关键词] 秦嘉;上计掾;黄门郎;士族;宦官

[中图分类号] I20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3-0105-03

Research of Cause for QinJia in Benjing

LIAN Zhenbo

(Department of Chinese; Dingxi Teachers College, Dingxi, Gansu, 743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why Qinjia, who was a poet of eastern Han dynasty, went to Beijing relates to the evaluation of his historical status. From the only remaining literature information, the true reason is that he was forcibly recruited by the court, and was passively involved in the eastern Han brutal political whirlpool, so that the talented poet fell silently.

Key words: Qinjia; Shangjiyuan; Huangmenlang; intelligentsia; eunuch

东汉五言诗人秦嘉的许多历史掌故,主要是据虞世南《北堂诗钞》卷一百三十六载:“(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汉)桓帝时任郡上计掾,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后来的《通渭县志》采用其说,代代因袭。至于秦嘉徐淑夫妇的身世,记载文字特别少。一般情况下,人们根据最早收录的秦嘉、徐淑赠答诗《玉台新咏·赠妇诗序》曰:“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而。”按照汉朝的惯例,每年各县的垦田、户籍、钱粮等要编制计簿,报送郡里,再由郡里汇总以副本呈送朝廷,此为“上计”,担任进京送上计簿的官员叫“上计掾”。正是因为秦嘉接受了这个差事,又恰逢徐淑生病回娘家养病,使得夫妻二人“不获面别”,只能借助书信互通款曲^[1]。但是,这个对秦嘉进京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经不住推敲。

一 进京是任职不是述职

《后汉书》未给东汉末年五言诗的奠基者秦嘉立传,造成了许多历史疑问。明代通渭知县张二南在《平襄怀古》中感喟:“寂寂空山中,竟得此双绝。何意范氏史,模糊多鹘突”。^[2]⁷⁴⁵后来人们以“应奉岁使”和秦嘉身为郡上计掾为依据,得出“岁使”就是去京履行上计掾的公务的结论。刘景云先生认为:“汉时专门由上计掾、史上计于朝廷。其职掌除奉达计簿外,还代表郡国守相参于朝会、备询政俗,且能评议守相的能否;承中央诏敕,宣达于守相,以为行政的准则”。^[3]汉代确实有地方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的制度,作为官员考课依据,被称作上计。《后汉书·百官志》:“岁尽,遣吏上计。”县道令长“秋冬集课上计于属郡国”。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长将本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

收稿日期: 2011-12-10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牛氏家言》校注与牛树梅教育思想研究”(S(2010)GX074)

作者简介: 连振波(1968-),男,甘肃通渭人,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甘肃地域文化研究。

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将所辖县道计簿汇总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考察地方官员政绩。每年岁终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常课”,三年一考察称“大课”。上计使者,西汉时县道上计郡国,由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中央,郡国守相却不亲往,而是派遣守丞、长史代行,称为上计使者。《后汉书·杨震列传》:“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乘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4]1772}但是,秦嘉是否也像这些“郡国计吏”成为追名逐利的“浮食者”呢?当然不是。首先,秦嘉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而是一个得“圣人之心法”的高士。据清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载:“如汉世之秦,明时之白,虽未能如周程诸子,有阐幽而发微,然而立德立言,皆称不朽,洵为一邑之文献。”^{[5]7-12}据秦嘉自己称言:“趋走风尘,非志所愿,惨惨少乐。”^{[5]10-54}可见他是一个高洁君子,自视甚高,不会挖空心思,利用“岁使”之便,为自己谋得一个“浮食”郎位的。其次,东汉的“岁使”制度,并不是只限于上计制度,朝廷奖掖人才、擢拔官员,推荐孝廉、茂才,也在每年的“岁使”之列。“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岁满课试,拜官有差……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6]338}尽管东汉的举孝廉制度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诟病,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童谣,但是,作为发现和培养官吏和官员预备人才的一种方法,被制度化的保存了下来。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4]1786}由此可见,秦嘉的洛阳之行,不一定是去履行上计掾之“岁使”之职,相反,他更有可能因为“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得以征召成洛阳之行的。其三,根据徐淑“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的说法,^{[5]10-56}秦嘉显然在出使洛阳之前,就知道了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愿意成为一个“浩然高素”的君子,而不愿意被人“驱使风尘”。然而,“博学宏词,驰声先汉”的他已经被自己的诗名和策论所累,再也不可能实现笑傲山林的理想了。其四,倘若秦嘉仅仅是进京送上计簿副本,接受朝廷和皇帝质询,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工作,两三月就能回来,何必要

带夫人眷属同行?但是,从秦嘉徐淑所遗留的诗文看,显然秦嘉是要带徐淑一同前往帝都洛阳的。“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5]10-56}可以看出,秦嘉在这首诗里,因为“去尔日遥远”,即日子太长,“遣车迎子还”一同前往,不料竟是“空往复空返”,徐淑的病让秦嘉多么失望和孤独。但是,从此可看出秦嘉赴京不是以上计掾的身份去洛阳例行“岁使”,而是受到朝廷征召要出仕为官了。

二 “屈王圭璋”受朝廷重用

据徐淑《与夫秦嘉书》载:“知屈王圭璋,应奉岁使。策名王府,观光上国。”^{[5]10-56}所谓圭璋,就是两种贵重的玉制礼器。《礼记·礼器》:“圭璋特。”孔颖达疏:“‘圭璋特’者,‘圭璋’,玉中之贵也;‘特’谓不用他物媿之也。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表德特达不加物也。”《淮南子·缪称训》:“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圭璋又比喻高尚的品德。《诗·大雅·卷阿》:“颙颙印印,如圭如璋。”郑玄笺:“王有贤臣,与之以礼义相切磋,体貌则颙颙然敬顺,志气则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晋陶潜《赠长沙公》诗:“谐气冬暄,映怀圭璋。”陶澍注:“怀有圭璋之洁。”圭璋也比喻朝廷有用的人才。这里到底是比喻秦嘉的品格还是写实?根据文意,应当是写实,是指丈夫秦嘉被朝廷重用,因为以徐淑之才不会不知道“圭璋”一词的分量。“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这说明只有天子近臣才有可能执“圭璋”之礼。关键在“知屈王圭璋”之“屈”为何意?“屈”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徐淑替丈夫自谦,有“委屈”之意。如“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诸葛亮《出师表》)二是“强迫”之意。“力不胜,皆屈为僮。”(柳宗元《童区寄传》)显然这是一封私人书信,徐淑没必要过分的和自己的丈夫自谦,因而被强迫的成分显得更多了些。秦嘉自己在诗文中也是这种情感的流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那么,为什么说是“强迫”征召的呢?延熹二年,梁冀被诛,许多士人依附梁冀。桓帝“悉收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弃市;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寅、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除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6]381}这时,皇帝急于士林的支持,稳定朝局和人心。但是,“尚书令陈番上书荐五处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帝悉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皆不

至。”^{[6]387}士林非但不为朝廷分忧,反而处处与为桓帝掌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宦官集团进行恶斗,对皇帝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桓帝为了争取士林,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强行征召诗名文章冠绝一时的秦嘉为黄门郎,既有爱惜其才华的成分,更多是对士林阶层的反击,是一种政治需要。徐淑也是深悟其中的要害,才安慰丈夫说是“仲尼执鞭之操”。

三 任黄门郎并非偶然

据秦嘉的第二首《赠妇诗》所述:“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5]10-56}我们可以看出,秦嘉任黄门郎不是通过豪门加士族的门道,对这一点秦家还是满意的。但是,黄门侍郎作为皇帝的侍从之官,能封黄门郎者并不多。汉代郎官较多,有议郎,文学郎等,唯独黄门郎乃中枢要职,在宫内“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等职责,^{[4]1786}是皇帝近侍。而五侯之中,单超、徐璜为中常侍,唐衡、左馆为黄门史,具瑗为黄门令。秦嘉作为海内遴选的清醇之士,能否与这些宦官同流合污呢?能够肯定,秦嘉不属于宦官一党,他跻身黄门,当然不能被宦党所容。但是,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论》:“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而其所宠信的宦官势力喜爱文辞、智术。陈寅恪先生曰:“东汉中南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两大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当汉末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则阉宦则重智术’。儒学在桓帝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了。”^[7]灵帝本人也不喜爱儒生,他更爱文辞之徒。光和元年(178年),灵帝还设置了以书画辞赋为取士方式的鸿都门学。

秦嘉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他开创了婉约诗之先河,开拓了诗歌创作题材。“歌诗宛约,妙语新声。”^[8]“可谓中国诗评理论上的‘婉约’之祖。”^[9]纵观东汉一朝,在文学史上能够和秦嘉相提并论者并不多见。这样秦嘉得到桓帝重视,不能不在桓帝黄门侍郎的首选之列。但是,黄门郎却是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争夺的核心岗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岗位,因为他时时和皇帝在一起,可以说是皇上的核心内参及政令的传达者,若非极端亲信,不能胜任此职。“按汉故事,中常侍参选人士,建武以后,乃息用宦官。自

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珥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放滥骄溢,莫能禁御,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为可悉罢省,尊复往初,更选海内清纯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6]387}这是朱穆任尚书时对桓帝上的一道奏章,由此可见,士人在与宦官集团的争夺中,也非常重视这些皇帝近臣的岗位安排。而朱穆在另一次见面桓帝时,更是直言不讳:“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族姓。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6]391}桓帝对中原士族(他们以清流自居)并没有多少好感,当然不会答应。于是,秦嘉入选黄门侍郎,成了桓帝的首选。这样既可以满足朱穆等士族集团“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的政治需求,也能够符合桓帝为首的宦官集团“尚文辞”,“重智术”的遴选标准,这迫使秦嘉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和选择,让他在“封赏逾制,内宠猥盛”的东汉宫廷和官场上跌宕沉浮。但是,秦嘉亦因此既为中原豪门士族不服,又成了宦官集团的眼中钉,在左右倾轧之中,被迫踏上了一条悲剧人生的征程。

参考文献:

- [1] 刘家忠. 两地书见证一世情——解读汉代文人夫妻秦嘉、徐淑的爱情[J]. 电影评介, 2007(2).
- [2] 张尚质. 通渭县志[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 [3] 刘景云. 后汉秦嘉徐淑诗文考[J]. 敦煌研究, 2003(2).
- [4]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5] 何大璋, 张志达. 通渭县志[M]. [出版地址不详], 清乾隆二十六年版本.
-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7] 陈寅恪.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M]//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25.
- [8] 徐淑. 后汉秦嘉徐淑夫妻往还书[M]//俄藏敦煌文献: 第12213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9] 温虎林. 秦嘉徐淑生平考[J]. 甘肃高师学报, 2007(3).

责任编辑: 骆晓会